

元。十月十一日又收法租界工部局赔偿潮州山庄出让土地费(上述2亩6分1厘6毫4地)每亩作价银3005两,合计7000两。现在法国工部局又要筑新马路,要求上海潮州会馆再次让出2亩2分之地。潮州会馆向其索土地赔偿费,完全合理。但因新上任的法租界路政司不了解其中原来情由,提出前上海潮州会馆与法租界工部局有约在先,不应付土地费,实不合理。潮州会馆即派董事黄少岩,向法租界工部局陈述原由。并特邀法租界路政司同往东嵩山路、西贝勒路、八仙桥两处实地详细勘察。法租界路政司在完全了解原来情况后,同意赔偿八仙桥山庄让地的款项。此事后来委托古沃律师办妥一切手续。

上海潮州会馆的另几个机构

上海岭南山庄

广东同乡在上海原有广东会馆(广东旅沪同乡会)、广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上海潮州会馆四个最大组织。除各会馆有自己山庄外,还有一“上海岭南山庄”。此山庄是清道光27年秋末,由黄来轩、钟集祥、韦东银、杨光裕等人捐资800余两银子置田21亩所建。作为广东人的义地。“上海岭南山庄”地处老西门斜桥路陆家浜,山庄内建有祠舍、名叫“庆善堂”,大厅内供有“观音娘神位”。凡是广东籍的人在沪病故,不能扶柩回故里者,都可以将灵柩寄于该屋内,或葬于其地。后来,由于兵乱、祠堙、房塌、坟荒,由同乡唐景星、徐雨之等人出面组成筹建组,花二年多时间用各粤籍商号的捐款重新修建,设专人管理山庄内一切财政事务。并对“岭南山庄”房屋、地产核实登记造册。清咸丰年间曾向上海县知事申请减免地捐。潮州人也有葬于此地者。因此,这座山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广东人的阴会馆。当然,广肇公所还有自己的山庄。

日军占领上海时,曾将各地抓来作苦力的民工住在山庄内。又临时搭建几间简陋房屋作马房。日军强迫抓来的中国民工,将墓地仓库里备用的700多块石碑以及木材、砖头,全部搬走。后来又将墓地周围石块,甚至一些公墓石碑也挖出运走。然后用一块木板写上原石碑姓名。山庄管理会董们知道后,都气愤万分,其中有一位陈老先生,年届八十,他说,我去跟日本人交涉。大家都劝他不要去,凶多吉少,万一出了事,生命难保。陈老先生对大家说,我年纪八十,不怕死,请大家放心。又说,我早年留学东洋,会讲日本话。便由其他两位姓周和姓李的会董陪同,来到浦东日军驻地,第一句话问日军队长。“你有父母吗?”日军翻译了日语。那日军队长气得暴跳如雷,骂“死老头,你是不是来惹祸、找死的?”陈老先生行个日本礼然后说:“既然你有父母,如何不在身旁服侍父母,跑到中国来糟塌别人的父母?”日军队长面色铁青地一拍桌子,叫老头跪下。陈老先生却仰天大笑,用非常纯正流利的日语说,中国伟大诗人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贫汉年届八十,早年留学东京大学。我的日本师长、同学、朋友都与我友好相处。日本也是礼义之邦,哪来开口骂人,动手拍桌子的日本长官,这有损日本人形象,要么,他不是日本人。我的大儿子也年已六十,对老汉也非常孝敬,不知长官年龄多少?日本队长见此老汉曾留学东京,认识日本名教授、学者和其他朋友,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顿时放下脸来,问老人家有何要求?陈老先生提出岭南山庄被毁坏的事,又说被毁坏的墓碑中,有一座是他父母的。说时泪流如雨。日军队长说,你父母墓地之事,让他调查后处理。并答应在他驻军此地的时间内,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情况。又开了一张借条,说明借到石碑900块,以此搪塞应付,并礼送陈老先生至门口。此事虽没获全胜,但陈老先生“单刀闯鬼子军营”,便在同乡间传开了。

潮惠会馆

上海还有一座“潮惠会馆”。它是潮阳和惠来商人所建。座落

在十六铺内关桥附近。占地几十亩。会馆造型像潮汕的祠堂，内有拜亭、大厅，厅内供观音娘神位。内有一戏台，每逢年暮谢神或祭忌节日请来潮州木偶戏和潮州戏班来这里演出。1986年12月24日，笔者曾同当时在潮惠会馆和潮州会馆当过差的姚老先生到旧地走了一趟。路上，姚老先生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抗日胜利后，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足球队几十人来上海江湾参加比赛。他的队伍初到上海时住在潮州会馆内。但没住几天，便打电话给上海潮州旅沪同乡会改住在东方饭店，即现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二楼。他们虽住饭店，但每天都吃包饭，由包饭人叫工人送去。送饭人姓陈，是潮阳人。姚老先生说：李光耀等人从住上海潮州会馆到调换新住处，都是通过我安排的。李光耀与我用潮州话交谈。我与胡健中、姚老先生三人，在原潮惠会馆旁找到了一位姓陈老人。陈老人现已64岁了，他是安徽人，八岁便到上海谋生，从八岁起就住在这里。他说，解放前，这座会馆大门口有牌楼、旗杆和一对石狮。厅堂画梁雕栋，神龛更是金光闪闪。谢神时宰猪宰羊，好热闹。小时我曾翻墙入内观看。敌伪时期，日本军队曾占住里面。后来，潮州人不知用什么办法，把日本军请了出去。国民党也曾在这里驻军。里面的戏台和门口的旗杆到“文革”时才被毁掉。

潮惠山庄

潮惠会馆还有一阴会馆，名叫潮惠山庄。座落在上海斜土路，正门写“潮惠山庄”，专门用于给潮阳、惠来在沪同乡去世后，寄存棺木。穷人寄棺木一般不用钱。寄棺木的同乡，可在条件具备时将棺木运回家乡安葬。但有一些棺木却长期放在屋里没有家属前来认领。山庄入门是一空地，两旁是格式相同的一排排房子，中间是一条条小巷，共有房子二百多间。每间房子约十平方米，规定放四副棺木。每间房子还有一处可烧纸钱的地方。棺木是放在两条椅子上。每条巷口有门，都用铜锁锁着，锁匙由山庄内看门人管理。

有钱人每间房子只放一副棺木。当时,一些有钱的潮州人都用巨款买棺木。最贵是楠木棺材,一副值大洋 800 至 900 元。当时,每两黄金只值大洋 30 元。也就是说有钱人用 30 两黄金买一副棺木,甚至有的用 100 两黄金买一副棺木的。可见当时潮州富商在上海的财力。每逢过年、过节、清明、死者忌日,这里举行祭拜。有到潮州请和尚来念经的,有做道场唱戏的。潮惠山庄由董事会负责管理。潮阳方面的董事都是溪东陈、沙陇郑、铜孟郭三姓组成。三姓在上海都是发大财的。

当时,有一个专门管理潮惠山庄的同乡名叫郭锦州。他是潮阳南阳人。此人是董事郭孚生负责推荐的。郭锦州全家住在山庄里,直到 1933 年才回乡。潮惠山庄,地处荒郊,强盗经常出没,夜里很不太平。郭锦州的任務就是看门保护好山庄。

上海潮州旅沪同乡会

上海还有一个“上海潮州旅沪同乡会”,1924 年会址设在原八仙桥尚义坊三楼前楼。会长是郑正秋,委员有郭仲良、郑子嘉、郑玉书、郭九如等人,其中还有当时上海造币厂厂长郭伯良。1927 年将会址迁到大世界对面。抗日胜利后,又搬到现西藏中路延安路口。第二任会长是郭伯良,第三任会长是郭九如,第四任会长是郑子良。不久会址又搬至永寿街升平里。新会址是一座楼房。

上海潮州会馆与各会馆的关系

上海潮州会馆在上海的社团活动中,凡是与广东人有关的活动,都与广东在上海的社团组织配合工作。1913 年 12 月 17 日,广肇公所来函,提出在上海筹建广东会馆。上海潮州会馆董事一致通过决议,赞同广肇公所提出的以广肇公所、潮州会馆两大帮为主以及嘉应会馆配合出资建馆的建议。在历年救灾的义举中,广东境内的一切救灾活动,广肇公所和上海潮州会馆都相互配合,共